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etailed, high-contrast image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relief patterns. These patterns, likely from the Shang or Zhou dynasties, consist of complex, interlocking swirling lines and stylized motif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The central text is contained within a light-colored rectangular box that has a slightly distressed or aged appearance, with a thin double-line border.

中国考古学

走出自己的路

张忠培◎著

故宫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

走出自己的路

张忠培◎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 走出自己的路 / 张忠培著.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134-1100-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5396 号

中国考古学 走出自己的路

张忠培 著

出版人: 王亚民
责任编辑: 宋小军 梅婷 骆艳
封面设计: 王梓
责任印制: 顾从辉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75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1100-4
定价: 76.00元

前 言

考古学不是中国的原创，中国的金石学没有发展为中国考古学。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进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安特生于仰韶村掘下第一铲，到 21 世纪初这近百年间，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踏着艰难、崎岖、曲折、迂回的历程，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历排斥、吸收，守旧、更新，终于找到了将引进来的西方考古学的一般技术、方法及理论，和中国考古学遗存及中国考古学遗存研究的实践结合、创新之道，走上并走出了自己闯荡出来的路，而且，人们还可以站在这路的终端向前瞭望，能看到这路向前指引的那清晰的方向。

这是我将以往自己，或和朋友一道写成的文字辑成这本集子所讨论的问题。我把这个集子所辑的文字，分成如下两部

分：其一，是前5篇文字，所讨论的是中国考古学已走上，且已走出了自己闯荡出来的路，这条路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中国考古学当前处在什么位置？她在世界的同行中站在什么位置？我们立在这路终端向前瞭望，见到的这路向前指引的方向，是哪个方向？今后应朝哪个方向向前闯荡，走出新路？其二，是其余的26篇。这26篇文字所涉及的，或者我想从某些方面用它们予以说明的是：在中国考古学已走出的自己闯荡出来的这条大路上，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尹达、苏秉琦、贾兰坡、夏鼐、宿白、邹衡、俞伟超、张光直、徐苹芳12位考古学者和顾颉刚、吕振羽、白寿彝、费孝通、张政烺、林志纯6位史学家及社会学家，闯荡出这样一条路，或为这条路拓宽，或为这条路向前延伸做了些什么？作出了何等贡献？对这第二部分，我又按照这18位学者所从事的专业，将这26篇文字分成两部分。这大致上是这个集子的结构。

中国考古学自己走出来的这条路，当然远不仅是由上述18位学者，而是由更多的学术精英闯荡出来的。这一认识，在辑在这集子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的历程》中，我已作了部分的说明。同时，我还得在这里指出，这本集子所讲的那12位考古学家，或是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国考古学的纵深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重要学者，有的甚至或是开创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在这些文字中，只能就我的认识所及，除对某

些学者做出的贡献做了某些说明外，大多未加论证，多半仅是点到为止，遗漏之处，自然不少。要详细地讨论这些学者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只能期望后来人了。

中国考古学要走什么路？我自觉地关心这一问题，始于1955年，现在回忆起来，记得历经了以下几个认识阶段。

1954年，在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的研究发展到批判胡适的这一运动中，我除了跟着运动进行学习外，还就自己学识所及，对截至那时为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路，进行了一番清理，萌生出以往中国考古学所走的路的认识。认为至今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路，是一条资产阶级胡适所主张的路，产生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统领中国考古学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以论代史这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领头给马寅初校长写反映考古学教学思想的信和我随后写的两篇批判文章表现得明明白白。

1955年秋进入半坡考古工地实习，到1964年写成《元君庙仰韶墓地》，认识到要扎进考古资料中去，“以论代史”的追求出现了动摇，“论从史出”的认识，从头脑中逐渐抬头。至1972年，我基本上是从个人怎样治学，来看中国考古学该走什么样的路。

1972年，我承担了在吉林大学创办考古学专业这副担子，便开始从如何办好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这一视角，来考虑如何按照中国考古学该走什么样的路，来培养什么样的考古人才，来考虑中国考古学未来走向的问题。

1975年，听了苏秉琦关于区、系、类型的演讲，认为应从区、系、类型论这一视角，来观察、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治理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就该走这样的路。

“四人帮”倒台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这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时期，我认识到考古学也该拨乱反正，但什么是“正”？什么是“乱”？浅层地来看，似乎明白了，深层地想一想，并不明白。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应从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这一实践来考虑。有了这一想法，便对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认真地理了一下。通过这一“理”，便清楚地认识到：考古学是科学，这科学正如其他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及技术科学那样，都仅以求“真”为目标。凡能抓到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真”，凡能抓到这“真”的技术、方法和理论，都是“正”；凡背离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真”，凡背离了能抓到这“真”的一切技术、方法和理论，都只能被认为是乱。此评判科学标准的“正”与“乱”不是研究者在其社会中所处阶级的利益、立场及观念，仅是这些学科研究对象自身存在的“真”，这才是判断任何学者在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和评判任何学者的主张的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这是我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产生的认识，随着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进展，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愈益得到证实，这一认识便成为了我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基本原则。老实说，我当时选择这一视角来进行考古学的“拨乱反正”的考虑，既

不那么明确，也谈不上有什么更远的谋虑，仅仅是出于“实事求是”的追求。同时，也当如实地指出的是，正是坚持了这“实事求是”的追求，遵循了这一“实事求是”思想不断地前行，到2014年的秋冬之交，我才认识到那条以阶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这一历史或社会观为核心的思想路线，是一阻碍和反对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思想体系。

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黄景略和我合作于1981年写成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五十周年》是第一篇，俞伟超和我于1983年合作的《探索与追求》，即《〈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是第二篇。这两篇的写作是在拨乱反正时期，自然是拨乱反正这一思想路线鼓励下的产物，但我们这“正”“乱”，突破了传统的某些教条，有着自己的理解。到1993年，当我发表《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似乎才将这一理解，搞得成熟一些。同时，我在这篇文字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又如何走向明天，这在80年代后期，明显地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当今是走过的历程的沉淀。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必须清醒地回顾昨天，同时，只有正确地认识今天，才能稳健地走向明天。为此，就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从引用这段文字可知，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已将找寻中国考古学未来的走向，作为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追求。

中国考古学自安特生肇始，由梁思永形成，成道于傅斯

年、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苏秉琦将之推至成熟期。所谓“成道”，是说基本上解决了将引进来的西方考古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同中国的考古学遗存及其研究实践相结合和走上了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之路这些问题。所以将之称为成熟期，是说已有了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产生了释读中国考古学遗存所体现的历史与文化的基本学说，即苏秉琦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及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走向秦汉帝国说。

自1949年之后，就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来看，可以说是遵循了实事求是这一科学路线，历经几代学人的拼搏，至苏秉琦提出“一论两说”之时，成熟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揭示、研究、释读中国考古学遗存所体现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认识的基本体系，从而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前头，使中国考古学走进了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其中的一部分还位居世界考古学的前沿，至此，中国考古学进入到了黄金时代，即苏秉琦时代。苏秉琦离开这个世界20年了，这20年中中国考古学虽有些发展，但时代没有变，中国考古学还处在苏秉琦时代。当前，以及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任务，是要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要走出苏秉琦时代，一是要承认苏秉琦时代；二是要搞明白中国考古学为什么能出现一个苏秉琦时代和走什么样的路，才走到这个时代；三是认清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前沿是什么，向前指引的路径

是什么。辑在这个文集中的我以及我和一些朋友合作的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些探讨。我个人认为，站在苏秉琦开创的苏秉琦时代的前沿，向后去看，便可看到苏秉琦所以能开创出苏秉琦时代，是他经历了曲折崎岖之险阻，坚持了立足于中国考古学遗存所体现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之实际，以此为据，反复接受它的检验，走上并走出了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实事求是之路。要走出苏秉琦时代，就得对苏秉琦形成的这条路，实现补短扬长，找出一条向前走出的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通过我的初步实践和总结，可概括为是具有这样一些基本内涵的路：既反对传统的教条，又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摒弃一切经验论，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层位学和文化谱系的类型学作为基本路径或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搞“实”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人、遗存、时、空这四维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客观的观察，通过比较研究，搞清楚它们之间自身实际存在的或是文化上的，或是社会意义上的，或具有其他的意义的差异、矛盾、关联和关系，进而给予符合这差异、矛盾、关联和关系自身呈现的逻辑关系的解释或释读。如果这一解释或释读符合这一逻辑关系，即是把逻辑关系所呈现出来的那差异、矛盾、关联和关系说通了，摆平了，这就求了“是”，即实现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追求。这就是我讲的举苏秉琦的旗，走苏秉琦的路的基本内涵。走出的这样的路多了，长了，就成了大道。这大道就是苏秉琦时代往前的一条路。可见，要走出苏秉琦时

代，还是遵循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的学术研究路线，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成果多了，出现一定质的升华，后苏秉琦时代就来临了。着什么急，这是急不了的事，得老老实实在地做。

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初，我的一些学生就向我提出要给我过80岁生日。大约从七十四五岁开始，凡到生日或我听到要给我过生日，心就咯噔一下，马上想到，又走近阎王爷一年！产生出了患难来了的感觉，当时还是这样，所以，便以这感觉为由，劝阻了要给我过生日之提议。

也是在那时，杨晶要接过我已做成了一些，但被我已一再推迟而认为实难以如期完成的、已决定中止的故宫博物院批准实施的“中国史前与夏、商时期长城地带陶鬲谱系之研究”科研课题计划。我已记不清楚她当时向我谈她这一设想时，是否将这事和我80岁生日联系起来，即使她这样对我说了，我定会拒绝的，但她要邀约其他同学接着我继续作陶鬲的研究，我定会同意的，同时，我也会向她说清楚我决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她（他）们做陶鬲研究，也就是说，他（她）自己去做就是了。大约在这期间，高蒙河对我说，先生，80大寿啦，出个集子吧！当时，我正想把任考古学会理事长期间发表的文字编成个集子。听了他这话，便说，编个集子倒可以，不要和80岁生日联系起来，就将拟编个任考古学会理事长期间发表的文字的集子的设想告诉了他。他倒痛快，这事就交给我吧！我正愁自己既无时间，又无精力做这事时，听了他这话，立即回应，你能做这事就好啦！他这次在我家中

同我谈话回上海后，立马做起这事来。不久，他来北京又到我家中告诉我，你未编成集子的文字不少，可以辑成好几本，除和理事长一职有关的外，你给别人著作写的那些序和为一些学者写的贺寿和纪念的文字，也都各自可辑成一个集子，还有……没等他讲完，我就说，你这主意还不错，我看先出这三本吧！其他的文章以后去编吧！高蒙河就按这三个集子规定的主旨，先编目，接着就搜集文章了。其中，我对他说，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便将已发表的文章复印下来，对着原稿，或仅对着复印件又改了一遍。这“改”，或是将排印不当而未校对过来的一些文字，或是编辑不当地改动了原稿，我又按原稿改过来的文字，或是原本我就写不清楚的一些文字，以及通过这一看，新发现的写得不当的文字。他听了我这讲，便又跑来北京，在我家翻箱倒柜，搜集、复印或拍摄这些复印件，为此，他从上海到北京跑了三四次，又将这些复印件认真进行审读、编目后交我，并按我的建议，寄给朱延平、田建文等人提意见。交我的目的，是同我商定三本集子各取什么名字和如何编目的问题，他对这两事都有自己的主张，我基本上采纳他的这些意见。关于书名，他建议我和《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这三本集子的名称相衔接。我接受他这一建议和他提出的书名建议后，又征求许伟、田建文的意见，请他俩提出意见，予以修饰，这便成《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

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这样三本书名。当然，这三本书和那前三本集子一样，书名虽有所因缘，但彼此间并不存在着什么“系列”。经我同意后，高蒙河便按我的意思把他编的这三本书交给了宋小军。我之所以要他交给宋小军，是因为我事前同小军说了，要他将这三本书先处理排版，以便我或其他朋友帮我审读，使书的出版质量有所保证。

宋小军于2014年就做出了这三本书的排版文件。我要了过来，粗粗地看了一下，认为有不少问题，如有些文章的文字表达不太明白，或同发表后的复印件上我已作了修改的文字存在着出入，还有就是辑于集子的不少文章的篇名需要改动，以及文章的编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有几篇按未经我审读的录音记录稿发表的文章，同我当时讲话用的提纲或写成的文字所表述的内容出现了较多的区别，等等。看来这些问题，基本上就得由我自己动手了。在自己动手做这些之前，我考虑到要完全靠自己做这些事，已自感到体力不及和精力不济，需要有人帮助，才能完成这些事情。谁合适？自然是高蒙河。但他在上海，难以随找随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找了朱延平，取得他的同意后，将排版文件及与其相关的材料，交给了他，要他一一是从校对角度看一看，错在哪里，该如何改。二是从文字、文章篇名以及文集如何编序等方面，找出问题。他做了这些事后，交给了我。我大致地翻看了一下，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觉得还是有不少失当乃至错误之处，没有指出

来,尤其是有些文章还有些词不达意,或该说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这样,我认识到更该自己动手了,但当年有他事缠身,至2015年,我就自己校这稿了。这校对是在朱延平校对的基础上进行的,除按校对要求校出并纠正了相当多的错误外,为了使文意表达得更清楚,作了不少的文字改动,对那些未经我审改的发表出来的记录整理稿,改动得更多。需指出的是,这些改动,仅是为了说清楚当时所主张的论点的文字改动,不改动原来的论点,则是我坚持的原则。也改了一些篇名,还对各文集、文章、编序,也做了一些调整。至此,我还没放下心来,转到2016年,我把被我校对的稿子逐一地再次交给了朱延平,要他再校对一遍,同时,又将当年发表出来的未经我审改的记录整理稿——《中国考古学:母权·父权·文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论坛”演讲提纲》交朱延平,请他去做大的修改。朱延平做完这些事后,分别将三本书的稿子又交给我。此时,我被疑得了肺癌,跑医院的时间增多,体力下降,精力愈益不济,本来计划自己再校对一遍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方面只得要求朱延平校改得仔细再仔细些,另一方面,又要朱延平将其新校改出来他认为应做怎样改动的那些文字,做出记号告我。在我精力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我仅审核了朱延平新校改出来并认为应做怎样改动的那些文字和对各文集的文字编序做出了新的改动,并就我认定的各文集的文字、新的编序意见和朱延平、高蒙河分别进行了讨论,又参考他俩提出的意见做了修改后,我才将这三

集稿子交给了朱延平，并对他说：“我只能做到这样了，这三本集子自此以后的事，就得请你为我管了，我希望和读者见面的文字，和我确定的这些文字，以及你最后校改的文字，是一样的。”这就是编这三本集子的基本过程。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这三本文集能编出来，并编成这个样子，实出于高蒙河和朱延平的费心、费力，还要指出的是，没有高蒙河的启动，则不会产生出这三本集子。宋小军参与了编辑这三本集子的全过程，许伟、田建文也为这三本集子的编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另外2014年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处长宋玲平知我编辑这三本集子之时，便将此事纳入她主持的科研处工作。2015年，当我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民谈及我在编辑这三本集子之时，要我这三本集子在他主持的故宫出版社出版。这三本集子的一些文章有的是我和朋友合著的，有的是朋友为我提供了初稿或素材、某些思路，有的是朋友为我提供了发言记录整理稿，有的是我的朋友为我修改成定稿的。可见，这三本集子汇集了很多朋友的智慧，这些我在有关文字后面为了表示谢意做出了说明。写到这里，我衷心地感到还得对以上说到的那些合作写作和助我编辑及促成出版这三本集子的朋友们再道声感谢。

（初稿于2017年1月30日，改于2017年2月24日16时，再改于2017年4月23日18时小石桥）

目 录

前言	i
----------	---

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	001
---------------------	-----

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	007
-------------------	-----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	024
---------------------------	-----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	053
-----------------------------	-----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 20 世纪的历程	083
---------------------------	-----

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 70 周年纪念	243
---------------------------------------	-----

中国现代化与考古学的里程碑——裴文中先生诞辰百年纪念	250
----------------------------------	-----

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五十周年	257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 80 周年暨昂昂溪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69
尹达先生至今仍生活在我们当中——2006 年 10 月 16 日在“纪念尹达先生诞辰 100 周年暨中国历史学论坛”大会上的发言	287
探索与追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	301
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拓者——沉痛悼念恩师苏秉琦教授	328
苏秉琦与 21 世纪考古学	335
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与永远屹立着的丰碑——在“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发现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347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	350